

经典

# 郝玉青：读英文版的金庸也要有同样的乐趣

□本报记者 王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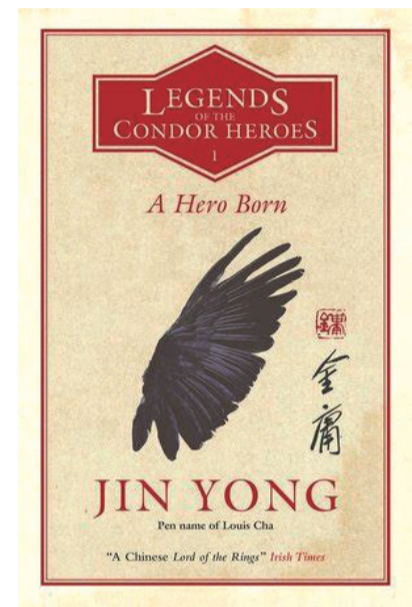
今年2月,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出版的《射雕》三部曲英文版第一卷《英雄诞生》正式面向全球发行,英语读者由此可以一睹金庸笔下侠义江湖的风采。5月31日-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2018年故事驱动大会”上,《射雕》英文版的重要推动者和译者、来自瑞典的文学经纪人郝玉青(Anna Holmwood)在演讲中介绍了《射雕》英文版第一卷的翻译出版历程。

## 60年后面世的英文版

武侠在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到了金庸创作的时代,武侠小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通俗文学门类。在众多武侠作家中,金庸可说是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据出版商提供的数据,金庸作品在中国的销量超过3亿册,就如《射雕》英文版第一卷出版后,《纽约客》杂志评论称,金庸及其作品带来了现象级的文化,就像“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的结合版。由此,郝玉青抛出了第一个问题:金庸最初开始发表作品距今也有60年了,为什么《射雕》之前没在英语世界出版过?

准确地说,此次出版的《射雕》三部曲英文版第一卷并不是金庸作品首次被翻译成英文。郝玉青介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香港有出版社曾经出版过金庸作品的精装英文版,如《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等。当郝玉青2012年开始推介和翻译《射雕英雄传》时,有些版本已经绝版了,没有绝版的也卖得很贵,她认为这与金庸写作所体现的氛围是不合的。此次出版的《射雕》三部曲英文版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共12卷,是第一次由英国出版社出版的筒装普通版。

郝玉青认为,金庸的作品之所以这么晚才正式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主要是因为对于西方和中国来说,都“时机不对”。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增多,但最初也仅限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交往,只有在最近15-20年才在文化上加强了对话。郝玉青认为,这并不代表西方人对中国不感兴趣,而是当时他们没有能力做到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但在十几年前,郝玉青留意到变化已经开始了。现在,西方有更多人开始学习中文,能流利地说中文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同时,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西方读者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找到金庸的作品,现在,有热情又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粉丝读者在全世界都能找到,中国的情况则是,很多中国读者听说将金庸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第一反应是“外国人真的可以懂吗,金庸真的



《射雕英雄传》英文版第一卷《英雄诞生》

可以翻译吗”,对此,郝玉青说,实际上,金庸在国外是有读者基础的,但在中国一直存在一种“这么中国化的内容能翻译好吗、能被西方很好的接受吗”的担忧,这恰好反映了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文化长期以来被世界所忽视了。郝玉青表示:“我很难理解这种想法。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更有信心了。”

## 跨文化交流:可控的独特

谈到中国化内容的作品是否能够很好地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这个话题,郝玉青表示,金庸作品被译介成英文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人们很容易预设一个充满当地文化特色的文本是很难翻译的,但郝玉青认为,一个作品的文化特质不会在翻译过程中真正成为跨文化理解的障碍,反而有可能让翻译后的作品更加突出,体现出一种“可控”的“独特”。

郝玉青认为,金庸的写作中有很多要素能够吸引西方出版界和大众读者,如关于历史的叙事、人物的品质以及作品中的魔幻色彩等。她列举了三个要素来说明英语读者能够和金庸作品产生共鸣。首先是《射雕英雄传》故事中历史背景的设置,西方读者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宋朝时期遭遇外族入侵的历史,这一历史背景能激发读者的兴趣,也让他们有一个渠道去了解宋朝及其后的历史。其次是金庸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物情感的表现很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郭靖从小背负

金人的杀父之仇,在蒙古成长;在后来的《神雕侠侣》中又要与养育自己的蒙古人相对抗……这些元素是具有世界性的,郭靖所经历的情感也是全世界共通的。第三,武侠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概念,但武侠小说对于西方来说并非完全陌生。也可以说,通过中国的武侠电影,西方已经推介过一轮武侠及其元素了;同时,与金庸武侠作品有类似之处的现代幻想类作品或历史虚构作品,在西方也很受欢迎。

郝玉青总结说,对这种有难度的文学作品的海外跨文化传播,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探寻可能性和潜力,去找寻那些可以跨过国界的故事,哪怕它们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或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这种独特性可能正是它的卖点。郝玉青透露,《射雕英雄传》英文版第一卷出版后,版权已卖到了美国、西班牙、德国、芬兰、巴西、葡萄牙、匈牙利等国,2019年美国也将出版该书。目前,由合译者张菁翻译的第二卷已经完成,正在编辑校对中。

## 文学翻译:靠着与郭靖同样的赤诚

郝玉青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并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8年前,郝玉青参加了英国文学翻译中心举办的前歌苓与翻译家尼克·哈曼(Nicky Harman)的研讨会。在研讨会期间,成为了英国文学翻译中心的第一批学员之一,拜在尼克·哈曼门下,与尼克·哈曼一起工作了6个月,获益匪浅,从此走上文学翻译之路。

郝玉青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她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译者,最需要的是耐心和谦虚。“我总是说,我所翻译的作者就是我的师傅,你需要保持好奇心,乐于从自己所犯的失误以及别人擅长的东西中汲取养分,像喜欢自己的母语一样喜欢你翻译的语言,并且要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

在《射雕英雄传》中,郝玉青最喜欢的人物是江南七怪,“我觉得他们是有缺点的英雄。他们的自负经常使自己陷入困境,但是他们非常有正义感”。她说,翻译金庸的作品其实有很大压力,需要从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角度来把握。金庸的作品确实聚合了很多传统文化要素,他的语言是口语化的现代文言文,用年长者的口气在叙述,但文字新鲜又不失生动。对照这一点,郝玉青翻译时也使用类似的英语表达,力求新鲜灵动、不老派,能动人。“读金庸是很有趣的,读英语版的金庸也要有同样的乐趣。如果中文版是能吸引十几岁少年深夜在被窝里偷着读的书,那英文版也必须要有一种感觉。”

对于作品中“江湖”“武林”等包含传统文化意味的词汇,郝玉青在翻译时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江湖和武林这样的词汇显示了中国武侠作者对自然景观的关注,大多数武侠作者都来自于远离朝堂的

地方,饱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纯粹之心。为了解释清楚这些概念,在序言之外,她用叙事口吻又写了一个3页左右的“写在前面的话”,让英语读者先有个概念,为接下来的阅读做好准备。对于作品中时常可见的诗词歌赋等,她表示,自己对中文诗词很有兴趣,也享受解决翻译诗词歌赋的困难过程。郝玉青说,在翻译过程中,金庸似乎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师傅,她必须不断调整、不断学习,“我有时候会把自己跟郭靖做对比,就像他学习武功一样,不是自然就学会了,必须靠着这份赤诚,我也一样,我知道我必须努力才能做好这个伟大的工作”。

## 文学经纪人的思考方式

目前,郝玉青正在翻译《射雕》三部曲英文版的第三卷,同时也在翻译一些瑞典语小说,还创作了一部针对年轻读者的原创作品,正在寻找有意向的出版社。除了译者,她还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经纪人,在加入英国DKW文学代理公司之前,郝玉青曾以文学经纪人的身份供职于台湾一家版权公司,除了代理西方文学进入大中华市场外,她还是一位推介中文作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幕后推手。

也正因为此,郝玉青是从文学经纪人和译者这两种身份的角度来了解出版市场,也是从这两个身份的角度出发来向英国的出版公司推介金庸作品的。在向出版社推介《射雕英雄传》时,她用了异常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准备给出版社的样章,因为“出版商是时刻准备找理由说不能的”。她以文学经纪人的思考方式尝试回答推介和出版金庸作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怎么说服经纪人和出版社来做这个出版选题,怎样让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在英语世界找到一个类似的已成功先例——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出版市场以及作品的市场定位,采取不同的策略,但这种做法也有争议。说到这里,郝玉青承认,是她自己发起了将《射雕英雄传》和《魔戒》相比较(在英文版封面的下方,印有一行《爱尔兰时报》的评论:“The Chinese Lord of the Rings”),这不太合宜,她为此道歉。

郝玉青认为,中国的出版社已经非常擅长找到适合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了,但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学的障碍比将外国文学引入中国要大得多。主要原因在于,99%的海外出版人自己并不会中文。所以,译者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一点却经常被低估。高质量的英文译本,尤其是全文翻译,是非常昂贵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文学版权的销售者和代理商都应该培养一支信得过的译者团队,并与其密切合作。如果能够很好地释放译者的能量和激情,将为文学版权推广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她认为,要想把出版商本身并不懂的一种语言的作品推介出去,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建立各方的信任。

中国新诗走过了100年历程,当代诗歌40年来取得了较高成就,中国诗人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进行广泛的国际诗歌交流。拉丁美洲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但目前对中国当代诗歌还缺乏了解,认知不足。近年来中国诗人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罗萨里奥国际诗歌节、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哥斯达黎加国际诗歌节上受到关注,哥伦比亚《普罗米修斯》、墨西哥《诗歌报》、阿根廷《当代》等诗歌杂志连续刊登中国诗人的作品,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出版社开始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兴趣。

近日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智利雷普门特出版社、古巴南方出版社即将推出西班牙语版),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在拉丁美洲的阅读、接受和传播具有开拓性意义。该书收入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诗人及近年参加拉美国际诗歌活动的多位诗人,共43位,涵盖了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到19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口语写作,以及“80后”“90后”“00后”等年轻诗人的写作,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生命意识与日常经验,语言呈现与先锋精神。

对于诗歌来说先锋是一种常态,但在当代诗歌里又确实稀有。什么是先锋呢?是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里跳出,写出带有个人语感与节奏的诗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写作内容与姿态上的先锋。中国当代诗人在中国写作,看到的是世界各个角落,诗人四处走动,获得更多的思考。我在2017年到了拉美,在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里思考,一是中国的,一是拉美的,中国的本土经验我已经烂熟于心,拉美的文学经验我早已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入,但毕竟是翻译获得的。而当我在他们中间的那些日夜,不同语言的朗诵与丰富多彩的拉美文化,令我感到先锋文学的传统无所不在。

我边走边写,留下了六七十首诗,集结为《从马尔克斯到聂鲁达》,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马尔克斯文化中心感受到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气息。在诗歌之城麦德林,我意识到这是诗歌的狂欢之地,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开幕式持续到天黑,世界60多个国家的诗人聚集在一起还不是什么奇迹,奇迹是城市中孩子、青年和老人都涌向诗歌朗诵现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和聂鲁达基金会,以及奇廉市圣托马斯大学组织的朗诵会上,我感受到拉美的诗歌文化。拉美的诗歌文化并不只是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帕斯、巴列霍、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科塔萨、穆尼蒂斯,还有胡安·赫尔曼、马加里托·奎亚尔等当代诗人,以及拉美民众对于诗歌的热情,这或许与他们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我想更多的是他们对于诗歌与生活、与世界的紧密关系的认同。回国后,我陆续读到了翻译家孙新堂翻译的马加里托·奎亚尔的作品,他写的是中国云南之行,我很高兴我与他无意间形成了一个诗歌写作的互动。

拉美另一个诗歌文化高峰则是对传统先锋的反叛,今年初离世的智利诗人帕拉“反诗歌”写作主张,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并不陌生。帕拉创作手法简洁,反对隐喻象征,语言上更趋口语化、散文化,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口语化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广受赞誉的智利小说家、诗人罗贝托·波拉尼奥更是视其为偶像。波拉尼奥曾说“我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发起“现实以下主义”诗歌运动的波拉尼奥评价说:“很糟糕。”这是另一种不断否定与更新的拉美先锋诗歌文化。

在编选《中国当代诗选》时,我脑子里不时蹦出在圣地亚哥聂鲁达基金会上三位曾获得聂鲁达诗歌奖的诗人形象,胡须雪白如安第斯山脉的雪,他们特意朗诵了口语化的诗歌,通过现场翻译,我对他们诗歌的节奏与短促的语气充满兴趣。中国当代诗歌进入拉美时遇到的首先是他们的阅读与评判。拉美诗人、读者迫切想听到中国诗歌的声音,我们在帕拉的故乡奇廉市朗诵时,92岁的智利诗人、智利语言文学学院院士雷内·伊巴卡切一直在现场,他说通过中国年轻诗人的语气和朗读感受到了中国诗歌。

我在读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时,想到我们的现代性之路与拉美的道路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历史的出发点与出发的时间不同,我们面对的精神危机与出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的是同样孤独的文学题材。我在圣地亚哥与当地一位曾经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现在像一头困兽一样的作家交谈,他面对中国诗人时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败”。我随后以一首诗写到他复杂的情感:“我站在胡安先生家的高窗边/看到圣地亚哥在夜色里灯火辉煌/这一夜胡安先生伤感地承认/他们是失败者/而我呢/我的失败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们不必掩盖失败。只有意识到失败,才能从被异化的现实中获得真实的自我,重塑历史,重塑身份,从而进行自我启蒙。加莱亚诺直接告诉读者:“写作是我击打和拥抱的方式”,立场之外,不发表中立或假装中立的言论,历史之内,为一直排在历史队尾的人写作。当我踏上拉美的土地,置身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背景中时,我深感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当103岁的帕拉逝世时,时任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西方文化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声音。”我们“独特的声音”在哪里呢?必须在我们的诗里。

# 当中国当代诗歌进入拉美

□周瑟瑟

## 西班牙艺术史漫步

# 索罗亚的“白色西班牙”

□张伟劫

喜欢看西班牙电影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西班牙人似乎从不忌惮讲粗话和展示裸露的躯体。在西班牙电影中,各种直译过来会让严肃者脸红的街头俚语自成一派风景,而男女裸体的直白展示似乎已经超越了情色的底线,令人疑惑这么大的“尺度”是否会有损电影的美学效果。记得我曾经的一位西班牙老师谈到过这一现象,在他看来,这是地中海文明的特有表现,想想古希腊人用石头制作的裸像吧……

宗白华先生在与中西美学时谈到,古希腊艺术家对赤裸人体的偏好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整个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希腊人住在文明整洁的城市中,地中海日光明媚,一切物象轮廓清楚。思想亦游荡于清明的逻辑与几何学中。神秘奇诡的幻感渐失,神们也失去深沉的神秘性,只是一种在高明愉快境域里的人生。人体的美,是他们的观念。在人体美中发现宇宙的秩序、和谐、比例、平衡,即是发现‘神’。”如果说希腊人的这种美学偏好影响了后世整个西方艺术进程的话,那么相比于其他欧洲人特别是北欧人,同样受地中海阳光养育、地中海海水滋润的西班牙人似乎更有理由认为自己继承了古希腊艺术的传统。

不过,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看来,西班牙人和古希腊人的美学偏好有一个深刻的差别:后者感兴趣的是清明的理性,是每个事物或生灵合乎常规的、快乐的那一部分;而前者

感兴趣的是事物的真实面貌,是形态各异的粗糙冷硬的个体。奥尔特加接着指出,西班牙民族灵魂的最深处,就是“地中海主义”,“地中海人”最纯粹的代表就是西班牙人;他们厌恶一切超验的东西,是极端的唯物主义者,因而西班牙人的艺术希望能保全事物作为实物、作为个体存在的原貌,对一切渺小、短暂、低下、卑微、粗俗的东西大加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委拉斯开兹在展现世俗生活图景时,会以倾注于表现人物形象的同时热情去描绘一只普普通通的水罐。

西班牙艺术中的这种“地中海主义”,或者说“地中海性”,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最直接地表现这种“地中海性”的,自然就是西班牙艺术家展现本国地中海风光的作品了。已经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西班牙艺术中,地中海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这一方面和地方艺术的兴起有关——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安达卢西亚这些西班牙地中海海岸地区涌现出一批善于表现本地风光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也与艺术技法的创新有关——地中海的阳光、沙滩和海水成为画家们探索色彩组合和再现光线的试验对象。在20世纪的这股“地中海主义”潮流中,最重要的引领者之一就是出生于瓦伦西亚的画家华金·索罗亚(Joaquín Sorolla, 1863-1923)。在进入成熟期后,他摒弃了之前惯于探索的社会现实主题,专注于表现纯粹的中海地中海风景和美景中的人,

这些作品成为最能代表西班牙形象的图像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的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一幅,画面展现了三个趴在沙滩上的小男孩。他们的排列由近及远,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也随之由浅入深,展示出色调的层次。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金发小男孩背对着我们昂起头,中间那个黑发男孩侧过脸来望他,两者之间似乎有语言交流,而最远的男孩则与后者有所重叠,这样画面中的三个人物就不至于互相孤立,而是形成一个内部有呼应的群组。他们任由扑向沙滩又回旋往复的海浪所冲刷,水面上有他们的倒影。这海浪的纹路,似是已经让我们听到了它的声音……日光在他们湿漉漉的肌肤上发出的反光,被画家精准地反映在画布上。仔细观察,这幅画不是简单的色块组合,每一处都能找到复杂的色彩构成。海水中有深蓝、浅蓝、翠绿、玫瑰红、铅灰等多种色调,小男孩们在阳光照射下的身体显现出不同的色彩。这些飞速涂抹的色块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的,与其说是法国印象派,不如说是戈雅或委拉斯开兹这样的西班牙绘画大师。是的,索罗亚代表的不是印象派,而是西班牙绘画传统。

索罗亚画的是地中海风光——地中海的风与光。正如进入晚年画技也臻入至境之时的委拉斯开兹画的是空气、是物体在光与空气中震颤而形成的视觉效果,索罗亚表现的是在地中海海风



《沙滩上的孩童》,华金·索罗亚,1909年,118x185厘米,布面油画,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吹拂下、艳阳照耀下的海水以及海水所浸湿的物体在眼中应当呈现的样子。在这些海滩小景中,没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没有西班牙天主教传统特有的悲怆意味,沐浴在这明净阳光和海水中的人们总是欢乐的、生气勃勃的,正如我们想象中那些自由地舒展躯体、充分完整地享受思维之乐和爱情之乐的古希腊人。在艺术史上已经得到承认的是,与同时代的苏洛亚加、索罗纳等画家所展示的那个阴郁的、透着宗教情感

的、以中部高原景色为主导的“黑色西班牙”相对立,索罗亚展现的是一个欢欣的、世俗的、以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海岸景色为主导的“白色西班牙”。这个“白色西班牙”相比于“黑色西班牙”可能显得肤浅,它可能更易于为外国人所接受,更适于拿来作国家旅游广告的背景图。地中海海岸的景色本就是美的,看过索罗亚之后再去看它,或许会觉得更美,因为画家有一个或许画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功能,那就是教我们如何观看。